



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



世界诸古代文明 年代学研究的 历史与现状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

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编.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1999. 8
ISBN 7-5062-4312-1

I. 世… II. 东… III. 世界史: 古代史 - 年代学 - 研究 IV. K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5123 号

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编 著 者: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纪 谊
装帧设计: 董 莉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
印 刷: 北京燕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500

ISBN 7-5062-4312-1/K·3

定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第九个五年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之一。

在独立起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历经五千年沧桑巨变而从未中断的，唯有中华文明，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的杰出贡献。不无遗憾的是，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由兴起走向昌盛的时期，而我国古史的确切纪年，只能上溯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始年——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再往前的历史纪年，或彼此歧异，或多阙失，难以考索。自西汉末年的刘歆起两千多年来，许多中外学者试图解决这一学术悬案。由于三代年代学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需要进行的研究非常繁多，使得任何个人的力量都难以取得突破。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要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制定夏、商、周这一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根据不同时期可依据的研究条件的差异提出以下具体目标：

1.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以前各王，给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 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给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 商代前期，给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 夏代，给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为了达到以上目标，“夏商周断代工程”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兼用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项目分设“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天文年代学综合研究”、“夏代年代学研究”、“商前期年代学研究”、“商后期年代学研究”、“武王伐纣年代研究”、“西周列王年代学研究”、“ ^{14}C 测年技术的改进与年代测定”、“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与总结”等 9 个课题，下设 40 个专题。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共 170 余位，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诸多学科领域。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各项预定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将于 1999 年内，公布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为了让国内外学术界和关心这项工作的朋友全面了解项目的情况，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以下两个系列：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收录项目的总报告以及各课题、专题的结题报告。总报告是在对全部课题的成果进行综合和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项目和整体成果的集中表述。课题、专题的结题报告包括发掘报告、实验报告和研究报告等，意在反映项目研究的过程和提供原始资料。此外，部分专题研究还将以专著形式发表。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收录在项目的进展过程中形成的专题资料汇编、札记辑集等，是围绕项目进行的辅助性工作的成果。

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并不是宣告已经达到终极的目标，恰恰相反，它标志着三代年代学研究开始步入新的阶段。我们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大批新的考古材料的出现，随着更多的研究者加入，我们一定能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不断逼近夏商周年代的真貌。为此，恳请国内外广大读者对我们已有的工作提出批评指正。

“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

1999年8月28日

前言

“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一个专题，我们所做的研究与介绍，事实上只包括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这两个大的文明地区，这是与我们十几年来所做的填补空白工作紧密相关的。

记得在80年代初，当时周谷老、吴于廑同志住在京西宾馆，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如何加强外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工作，有时也邀请教育部的有关同志一同探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我们三人遂联名向教育部提出“关于加强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1984年，教育部以054号文件批复。根据这一文件，在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IHAC）。研究所设置大学本科高年级古典文明试办班（文科各系，尤其历史系四年制后两年），首先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各校招生，学科以世界古典文明，尤其以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希腊拉丁古典学为重点。

同年，我们又一同联名发表了《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一文，以期进一步加大填补这些空白学科的力度。1986年，我们创办《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JAC）（西文版年刊），对外公开发行，现已与国外三十多个研究机构与大学建立了对等的学术交流关系。另外，为了促进中外古典文化交流，为了把西方古典文化引进中国，把我国古典文化向世界传播，特别是为了配合填补空白工作，我们还着手编印世界古典文明丛书。这套丛书采用中外文对照本：近东文献用拉丁化的楔形文字或象形文字与中文对照方式，西方古典文献采希腊文、拉丁文原文与中文对照方式，中国古典文献则采中国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和现行文字与英译对照方式。

1988年，原国家教委下达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点名单，指定东北师范大学为“世界上古、中古史”重点学科点。我们深感责任重大。经过十幾年来的努力，从各校遴选来的学生相继读完硕士、博士，他们大多是在国内完成的学业，也有的是在国外，现在大都在国内外的科研机构从事古代近东或西方古典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次参加“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的既有学成回来或留校工作的同事，还有在所里工作的外国专家和在读博士研究生。“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九五”期间重大科研项目，注意到我们所从事的学科建设，使我们有机会参与中国史学领域的研究，无疑也是对我们填补空白工作的一次检验。

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的断代研究在国外已有多数。古代两河史、埃及史以及赫梯史，其年代框架事实上即是在不断地释读、勘定考古文献的过程中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希腊罗马史然有古典著作流传于世，年代学研究起步也较早，但随着新的考古遗存的发现，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的介入，使得业已成型的年代框架不断的得以修正，年代日趋精确。

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文献中的天象记载对于确定某些重要的年代，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针对利用天象记载在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几种年代值，国外各学科的研究人员，包括古

文字专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版本学家曾几度会集在一起，一同来研究探讨所谓“上限、中限和下限”问题，以寻求较为合理的定年途径。近些年来，中、下限说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在不断肯定与否定过程中建立起的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的年代框架，较为客观地展现出历史发展的轨迹，科学研究正是需要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

我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同两河流域、埃及、希腊罗马一样，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夏商周作为文明初史阶段，断明三代的历史年代，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国家投巨资，联合各学科一同攻关，这在我国、在世界史学领域恐怕还是第一次。可以预见，我国年代学研究成果必将推动世界年代学研究的发展。我们在完成专题研究的同时，感到有义务也有责任把中国成功的经验介绍出去。

林志纯

1999年7月于长春

目 录

综 论

- 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综述 张强 (1)

古代近东

- 古代两河流域的年代学 [美] 布劳恩·丹顿 (7)
古代埃及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郭丹彤 (10)
古埃及年代学——材料、问题与框架 李晓东 (35)
赫梯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刘健 (45)
阿米塞杜喀的金星泥板 曲天夫 (69)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吴宇虹 (82)

西方古典

- 帕罗斯碑铭文与希腊年代学 郝际陶 (107)
早期希腊年代学——文献传统 [英] 马克·麦克德莫特 (123)
罗马年代学与卡皮托执政官表 王乃新 (139)
执政官年表与早期雅典历史的年代学 晏绍祥 (154)
特洛伊战争的年代 张强 (168)

附 录

- 中外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比较 李学勤 (173)

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综述

张 强

“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子课题研究中的一部分，任务是对古代近东及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较为全面的总结，目的是为这项系统工程提供参考与借鉴。经过近三年多的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这一课题现已完成，希望对我国早期历史的断代研究能有所裨益。

两河流域、北非的埃及以及小亚细亚的赫梯传统上统称为古代近东，西方古典指的则是希腊和罗马。年代学上言之，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在构建各自年代框架的过程中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二者在研究方法上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现就这些古代文明的年代学研究状况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分别择要述之。

年代学的史料及研究方法

年代学作为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举凡考古、文字、历史、天文等学科均可作为其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则为年代的确定提供了较为有效的研究手段。就年代学研究可资利用的材料性质上看，可分为文字出现前和文字出现后两个时期。我们所关注的是文字出现后年代框架的重建，而这一时期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运用有限的资料把古代纪年换算成现行的公元纪年。

1. 两河流域

古代两河流域作为世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很早就采用了较为成熟的纪年方法。就出土的大量泥板文书而言，其中很多王表、名年官表以及天文现象记录等，均可作为年代学研究的重要史料。

从约公元前 3300 年古朴象形图符的出现到公元前 323 年波斯帝国的灭亡，两河流域文明经历了 3000 余年的历史。由于初史时期（公元前 2900—2300 年）研究资料的匮乏，两河流域年代学者一般采用由文献相对丰富的晚期（公元前 1000 纪、公元前 2000 纪）向早期逐步推进的研究方法。

（1）公元前 1400—323 年

公元前 1400 年至公元前 323 年是为两河流域的古典帝国时代。这一时期的年代学文献丰富而可靠，主要文献有《亚述王表》、《亚述名年官表》以及《托勒密国王经典》。

《亚述王表》记载了亚述早期王朝到帝国后期所有在位帝王的统治年数。依照《亚述名年官表》不仅可以确定亚述帝国晚期诸王的排序和在位年数，而且可以佐证《亚述王表》的

可信程度。成书于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国王经典》记载了从巴比伦王那布那萨尔(公元前747年即位)到马其顿亚力山大大帝30位巴比伦统治者的在位年数以及重要的天文现象,如发生在亚述帝国阿淑尔丹在位第10年的一次日食,经推算为公元前763年6月15日,以此为基点,便可推导出阿淑尔丹前后各名年官的公元纪年。

(2) 公元前2000—1400年

公元前2000—1400年为两河流域的王国时代。《亚述王表》中由于这一时期的记载出现残缺与误差,且无名年官表可资参考,所以年代框架的重建工作需要依靠古文献中天文现象的记录与现代天文学计算来修正王表之不足部分。

古巴比伦王朝第10王阿米喇杜喀在位的第1—8年有关金星观测记录是确定古巴比伦时期绝对年代的关键所在。现代天文研究对阿米喇杜喀元年所得出的多种公元年值,巴比伦王朝第六王汉穆拉比元年因此也出现了多种选择。鉴于汉穆拉比时代丰富的史料和考古遗存以及¹⁴C研究方法的运用,为阿米喇杜喀绝对年代的最后选定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3) 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年代

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历史为城邦时代。早王朝、阿卡德、乌尔第三王朝及伊辛第一王朝的重要史料有《苏美尔王表》、《伊什比埃腊(无头)年名表》和《乌尔和伊辛名年表》。伊辛—拉尔萨时期由于与古巴比伦王国关系紧密,故可根据古巴比伦王朝的年代值推导出伊辛—拉尔萨时期的绝对年代。乌尔第三王朝凡108年,以色列学者通过对年名表的研究,得出了该王朝的绝对年代,时在公元前2111—2004年。由此赓续上溯,有关各邦统治者的记载多见于《苏美尔王表》。但是,由于现代学者对王表理解上的不同,从而导致了阿卡德公元元年研究上的纷争。就目前研究而言,公元前2334年说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阿卡德王朝统一两河流域前,为城邦争霸时期。古巴比伦时期的《苏美尔王表》中所记载的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大多以人神参半的面目出现,且在位年限140年者有之,1200年者亦有之,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考古学手段把这一时期概定为“早王朝”,分早、中、晚三个时期。

2. 古代埃及

与古代两河流域一样,埃及年代学研究亦有着相对丰富的纪年史料,如王表、国王家谱、铭文及天象记录等。根据这些带有文字的古代遗存,并以第二十六王朝(后王朝时期)为基点,由后向前推,便可建立起古代埃及历史沿革的年代框架。就历史分期而言,古代埃及史大概可分为前王朝(史前文化)、早王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新王国、第三中间期、后王朝时期及希腊罗马统治时期。

埃及年代学意义上的“王朝”是由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僧侣曼涅托在其《埃及史》一书中划分界定的。后人在其30王朝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王朝,凡31个王朝。

(1) 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及后王朝

从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4—525年)到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入主埃及,这一时期埃及年代学资料明确而丰富,其他地区,如两河流域、希腊罗马等,也有着大量的相关记载,定年简便易行。

(2) 第三中间期

第二十一至二十五王朝在位27王,统治413年。第二十二王朝始于公元前945年,是为第三中间期的一个关键数值。这一年代是以第二十六王朝为起点,并结合亚述与希伯来年代学研究成果而确定的。另外,多种语言文献的出现以及波斯、罗马等历法的传入,为年代

的换算提供了便利。

(3) 新王国

第十八至二十王朝历 14 王, 统治 165 年。新王国年代学主要的研究资料有王表以及诸多官员的私人文献。而神庙遗址之间的承接关系可以确定各王朝的起讫。天狼星偕日同升的天象记录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一时期的年代。

(4) 第二中间期

第十三至十七王朝在位 9 王, 统治 236 年, 特点是几个政权并存。带有王名的印章、《都灵王表》及曼涅托的记载为确定第二中间期各王朝的重要文献。

(5) 中王国

第十一至十二王朝计 15 王, 从公元前 2106 年到公元前 1786 年统治了 320 年。这一时期的文字材料大多来自考古遗存, 其中包括遍及上下埃及的坟墓、神庙、石碑及雕像上的铭文。第十二王朝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治下的第 7 年出现天狼星偕日同升的现象对第十二王朝年代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由于对观测地不同的猜测, 所得出的年代值也各有不同。

(6) 第一中间期

第九至十王朝凡 17 王, 但只有两个国王的名字流传下来。第九王朝前四王在位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2160—2100 年。第十王朝的具体年代不详。

(7) 古王国

第三至八王朝计 44 王, 统治 540 年。由于这一时期在位国王较多且统治年限较长, 所以国王间的先后排序以及在位时间的确定便成为焦点问题。《都灵王表》和《阿拜多斯王表》与其他文献的相关记载相悖时, 只有通过带有文字或不带有文字的考古遗存来解决。

(8) 早王朝

根据《帕勒摩石碑》的记载, 第一至二王朝凡 300 年, 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3000—2700 年。在位王文献记载不一, 盖 14 人。

3. 赫梯

与近东其他地区相比, 赫梯年代学研究既没有专门的王表, 也没有确定的纪年方法。因此, 以楔形文字符号学为基础, 通过官方文献(年鉴、条约、外交信函等)与两河流域和埃及相关记载进行比较研究, 并结合考古地层学与古器物学定年是赫梯年代学研究的一大特点。

广义上讲, 从赫梯民族约公元前 19 世纪迁移并定居在小亚细亚半岛到公元前 1200 年赫梯因内外部原因灭亡, 赫梯的历史不足千年。狭义上讲, 若从哈图西里一世约公元前 1600 年在哈图沙建都算起, 赫梯历史不过 400 年, 分为古王国、中期赫梯及帝国三个时期, 在位约 12 王。鉴于赫梯年代学自身的研究特点, 其年代框架的建立很大程度上需要参照近东其他地区的年代而定。

4. 希腊罗马

希腊文明对继之而起的罗马文明影响很大, 罗马年代学研究自然也离不开希腊年代学的传统; 在年代学的史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也有着相同之处, 故在此一并述之。

同近东地区的王表、名年官表、碑刻、印章等以楔形文字、象形文字为载体的考古遗存相比, 希腊罗马则以经文艺复兴流传下来的希腊、拉丁文献为主。

就希腊早期历史而言, 大概可分为迈锡尼时代(约公元前 1500—1100 年)和黑暗时代

(约公元前 1100 — 800 年) 两个时期。迈锡尼时代的线形文字 B 是希腊已释读成功的早期文字, 所载内容极为有限。作为西方古典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发生在公元前 1250 年的特洛伊战争是这一时期的关键年代。迈锡尼文明衰落后, 希腊历史进入几无文字的所谓“黑暗时代”, 有关这一时期的风俗习惯和政治制度大多源自荷马史诗。

在年代学研究的划分上, 公元前 6 世纪以前的断代归属于早期, 因为从公元前 5 世纪起希腊才有较详尽的历史文献传世, 其中包括对早期历史的追溯。直到公元前 3 世纪, 以雅典执政官年表为基本线索的雅典早期年代框架才得以建立。雅典开始实行一年一任的执政官制度之年为雅典的元年, 时在公元前 683 年。

据古史记载, 希腊古代大小城邦数以千记, 各邦几乎都有自己的纪年系统与方法, 甚至同一个城邦会因时间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历法。公元前 5 世纪末, 出现了一种以四年一度奥林匹克赛会纪年的全新体系, 而第 1 届赛会(公元前 776 年) 则成为希腊正式纪年的起点, 也使得执政官年表有了相对应的参照值。

崛起于西地中海的罗马, 于公元前 1 世纪已基本统一了地中海地区。这一历史格局的变化亦影响到纪年方法上的变化。罗马史家狄奥多鲁斯(约公元前 80 — 21 年) 在其《历史文库》中, 采用了奥林匹克赛会纪年、雅典执政官年以及罗马执政官年的综合纪年法, 从而把希腊传统与罗马历史联系在一起。

至于罗马自身的纪年方法, 最具年代学研究价值的当数公元前 3 世纪的大祭司年代记, 这种逐年记事方法对早期罗马史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马史家加图接受了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后率部到意大利建立罗马城的希腊传统, 并把罗马城的建立定在特洛伊战争后的 423 年。罗马建城的时间作为罗马的元年之一, 罗马史家的记载各有不同, 公元前 1 世纪瓦罗的公元前 753 年说影响最大。他采用的“自建城以来”的纪年体系是为一种相对纪年的方法。奥古斯都时代制定的卡皮托执政官表部分继承了瓦罗年表, 但在一年起止的计算上却有着不同点。所以, 如果根据执政官表纪年, 公元前 509 年则为罗马历史的又一个元年。除了上述纪年外, 罗马纪年方法还有行省纪年、戴克里先纪年以及耶稣诞生纪年。由于这些纪年的起讫各有差异, 所以换算成现行的公元纪年亦有区别。

所谓的“公元纪年”, 是 6 世纪著名宗教法规学者小狄奥尼修斯创立的。他根据罗马的纪年传统, 推算出耶稣基督诞生于罗马建城后的第 753 年, 这一年即为基督元年, 为公元元年。宏观上讲, 以公元为坐标、一元时空意义上的西方古典绝对年代框架的建立, 正是以公元元年为出发点并将罗马儒略历向前延至远古时代的一种时间排序。

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及所存在的问题

两河流域与赫梯的古文字形式是一种用削成楔形的芦苇压印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 与形、声、意兼备的埃及象形文字一样,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渐渐被弃用, 最终成为无人知晓的“死文字”。人们对这些地区的认识与了解也只限于《旧约圣经》以及西方古典著作中一些零乱, 有时甚至是歪曲的记载。自上一世纪初起, 随着近东地区大量泥板文书、碑刻和纸草文书的出土, 以及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的释读成功, 尘封了几千年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才为世人所知。全方位研究这些古代文明的新兴人文学科——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的建立, 标志着古代近东各地区年代学研究的开始。

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发端较早, 第一部系统的年代学研究著作是公元前 3 世纪末埃拉托

斯特奈斯所著的《编年史》。他利用当时在亚力山大里亚图书馆的工作之便广泛涉猎前人著述,在综合希腊各邦不同编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统一的纪年体系。埃拉托斯特奈斯的后继者们不仅接受了其著作中有关希腊早期的历史年代,而且还有所创新。公元前1世纪,卡斯托尔的年代学研究延伸到两河流域和埃及,并把这些古老王国的历史同希腊罗马传统联系起来。这种纪年方式在公元4世纪尤塞比乌斯的著作中表现得更加完善。

纵观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历代年代学学者均是采用的从资料相对丰富的晚期向文明初始的早期逐渐推进的研究方法;就文明发生的时间上看,则是从罗马希腊上溯至埃及至两河流域。

同西方古典学相比,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建立伊始即面临着对考古出土文献的校勘与定年。随着考古遗存的不断增多以及科学研究手段的进步,特别是天象记载的出土发现,近东地区各文明史也在不断地改写,各自内部的年代框架在不断的否定与重建中逐渐完善起来。以两河流域公元前2000—1400年王国时代绝对年代的确定为例,自从1912年《金星泥板文书》发现以来,亚述学者对古巴比伦第十王阿米喇杜喀在位元年的天文研究先后得出了9个绝对年代值。

1928年,福瑟林海姆根据兰登和肖赫推算,提出了五个不同的阿米喇杜喀元年度,并认为最有可能的元年度是公元前1920年。若按此推算,古巴比伦王朝的末年在公元前1868年。1940年,西德爾斯基提出了公元前1702年说,把两河流域的历史缩短了220年。同年,温格那德也对公元前1920年说持有异议,他认为阿米喇杜喀元年在公元前1645年的可能性最大,比福瑟林海姆的公元前1920年说晚275年。从1942年到1972年间,亚述学者又提出了公元前1581年说,而温格那德的公元前1645年说重又得到韦尔的赞同。然而,古巴比伦王朝年代框架的建立仅仅依靠天文数据的推算是不够的。解决该王朝的年代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第六王汉穆拉比元年的确定。作为统一两河流域的有为君主,汉穆拉比曾数度远征,考古遗存较多,易于采取多种方法进行综合研究。

事实上,对汉穆拉比元年的研究早在1888年即已开始,有公元前2394年说,公元前2003年说。汉穆拉比的元年在阿米喇杜喀元年之前的146年,若根据较有可能的阿米喇杜喀元年的4种说法(公元前1920年、公元前1702年、公元前1645年和公元前1581年),汉穆拉比的元年则分别为公元前2066年、公元前1848年、公元前1792年和公元前1728年几种选择。通过对叙利亚阿拉拉遗址的地层及文物研究表明,汉穆拉比所处的年代在公元前19世纪或18世纪,显然与公元前2066年时间上相悖。另外三个元年度数值则为学界所认同,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上限、中限和下限”三个年代系统。宏观上讲,采用哪一种年代系统对两河流域整个年代框架都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中限与上下限的时间差不过60几年。但问题的关键是哪一种更接近史实。美国学者罗顿1958年的研究表明,中限年代具有较为合理的一面。他的具体做法是:①用尼普尔城乌尔第三王朝伊比辛时期屋舍内与乌鲁克城乌尔那穆时期庙宇内的碳块进行 ^{14}C 定年;②对《亚述王表》中残缺的两位国王的在位时间进行统计估算;③利用赫梯与埃及相关资料进行比较研究;④推究亚述王提格拉特皮莱沙一世建庙王铭中所提及的亚述国王的统治年数。罗顿的研究结果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当然,部分学者在著述中仍在使用上限与下限的年代系统。1987年在哥德堡举行的年代学会上,天文学家胡伯通过对《金星泥板文书》、古巴比伦时期和乌尔第三王朝每个月份的天数以及日食、月食资料的记载研究,完全否定了阿米喇杜喀元年的中限与下限年代值,认为绝对正确的应为上限。

这种上中下限年代系统的选定,同样表现在埃及年代学研究的过程中。发生在中王国与新王国天狼星偕日同升的两次天象记录是确立这两个时期乃至整个埃及年代框架的重要资料。但是,由于观测地点的不同(据猜测发生在底比斯、埃及南部的埃里芬汀和孟斐斯附近),从而导致了上中下限三个不同的年代值。而任何一种年代系统的选定,均会影响到整个年代框架的前移或后推。

鉴于年代学研究资料来源与古代近东的差异,西方古典学者在古籍整理与校勘过程中,对晚期文献中一些早期年代的记载始终面临着“信古”与“疑古”之争。这种学术分歧在特洛伊战争的确定及定年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记载最早见于荷马的《伊利亚特记》。什里曼根据史诗中的描述,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先后在小亚细亚西南部一处被土耳其人称之为希萨利克的古代要塞遗址进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并称他在那里找到了荷马笔下希腊联军的远征地——特洛伊。继什里曼之后,对特洛伊的考古发掘研究不断深入。著名考古学家布利根通过对特洛伊遗址地层的重新分期,认为特洛伊 VIIa 的遗存正是特洛伊古战场的所在,时在公元前1250年,等同于希罗多德的最早定年。除希罗多德外,其他古典史家及铭文的记载说法不一,大多集中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鉴于荷马在其史诗中既未言明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年代亦未论及特洛伊地在何方,考古发现又均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遗存,所以现代学者往往人言言殊。自从本世纪初瑞士学者福勒撰文称他在赫梯泥板文书中释读出阿卡亚人及荷马笔下特洛伊战争希腊诸英雄的名字起,“信古”学者对特洛伊战争爆发的时间与地点又找到一个有力旁证。

但是,以芬利为代表的“疑古”派,基于缺乏直接的原始记载,全盘否定了特洛伊战争的历史真实性,并以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法国的《罗曼罗兰之歌》以及前南斯拉夫有关科索沃战争的史诗为例来证明史诗作为史实的不可靠性。1964年的《希腊研究杂志》同期刊登了有关特洛伊战争的专题讨论文章,“信古”与“疑古”两派论争激烈,迄今未息。

18世纪以来,为数不少的学者对罗马早期历史传统也持怀疑态度,但是,考古研究成果如今已基本证明了罗马早期历史传统真实性。古代传统并非空穴来风,无所依据,无论在古代近东史还是在西方古典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均证实了这一点。

就目前年代学研究现状而言,年代学者对各文明地区早期的大部分年代定年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推算出大致的年代值;即使是资料相对丰富的晚期的一些年代,也会因记载上的相互矛盾或因多种选择而无所适从,往往只能以“c.”(拉丁文“circum”之缩写,意“约”)或“?”等字符来表示某一绝对历史年代的不确切性以及年代学研究上的无奈。从年代学发展角度来看,这种尴尬的局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材料的新发现以及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的不断进步而得以改观。历经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对几千年以前的历史年代毕竟有了选择,即使有时是无奈的。

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在我国的研究刚刚起步,对西方古典的研究也相对滞后,而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年代研究与介绍更显薄弱。我们希望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契机,加强该领域的研究与介绍。有理由相信,我国早期历史断代研究的途径和手段对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也将会有所启示。

古代两河流域的年代学

[美] 布劳恩·丹顿

考古学的功用之一在于揭示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这些事件往往没有任何文字上的记载，且没有明确的时间断限。这类重建历史的工作依赖于我们确定大量零散时间记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把它们与当代的公元纪年结合起来。多数考古学者将史前时代后期及有史时代前期的年代分期，以确定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相对年代确定一些历史事件之间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绝对年代试图确定一个历史时期或文化群的比较明确的发生或存在时间，将确定它们确切的发生和灭亡的年份。

确定相对年代的最有力的工具是地层学。在一个考古遗址中，相对早一些的考古遗存一般来说位于较晚的考古遗存的下面。地层学提供不同地层的考古遗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但是无法提供准确的时间差。较厚的地层，一般来说，其存在时间要长于较薄的地层，但并不是绝对的。所以，地层学并不能提供绝对的年代断限。若一个考古遗址的各个地层无法通过地层学的方法与另外一个考古遗址的各个地层联系起来，考古学家将以另外一种称为“交叉断代”的重要方法确定地层之间的联系。

“交叉断代”对比不同考古遗址中相同形式的考古遗存，其基本想法基于不同考古遗址中相同的考古遗存应大致处于同一时代。“交叉断代”要求这些考古遗存，如陶器、硬币、武器等，必须在一种文化生活的特定的时间内出现。若相同的考古遗存在不同的考古遗址中出现，这表明这两个考古遗址所包含的文化现象在时间上基本相同。但是，使用这种“交叉断代”的方法必须注意“祖传物因素”。有些遗存，如精致的石制器皿、金属制品、进口物品以及印章等有可能是由上一代传下的传家之宝，因此不能与其他同期出土的考古遗存相提并论。若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有贸易往来关系，而后的年代学定年通过文献学证据已经十分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交叉断代”的方法的作用就愈加重要。这样，“交叉断代”可用于帮助确定绝对年代。

有时，特别是当一件文物的发现没有较好的发现记录的时候，它的大致的年代可以通过图像分析的方法确定。这种方法是“交叉断代”法的另外一种形式，它的依据是任何一种文化类型，其遗存物的主题和格式都出现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有些遗存的纹饰或画像是仿古的，这类遗存的年代就有可能要早于它的正确的年代。

早些时候，一种最重要的确定绝对年代的方法是 ^{14}C 断代法，是W.F. 利比在1949年发现的。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是碳样品在氮中， ^{14}C 的放射性同位素值周期性减少，同时伴随着当一种机体死亡和消亡时元素的变化使 ^{14}C 改变。这种方法用于测定一种古代的生命物质所含碳元素的低水平同位素值的数量。通过这种方法，可能测定出一种植物或动物死亡的时

间。只有当考古学家用正确的方法收集到用于测试的样品,而且测定手段极其精密时,这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才有价值。放射性碳元素的结果是测定的结果。 ^{14}C 的大气的产物是不稳定的。所以,放射性同位素的定年是可调整的,或是可测定的,并可将这些连续变化的数值纳入到公元纪年中去。正确的表述方式是数值 $\pm$ 表示上下差在100年。

在两河流域的考古学中,放射性同位素定年广泛应用于北部地区新石器时期遗址的绝对年代的定年中。但是,由于从那些遗址中得到的年代值不多,考古学家们必须依靠从诸如安那托利亚和伊朗等周边地区得到的数值确定年代。乌鲁克时期的考古遗址状况与此相同。

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700—2330年)的绝对年代的确定有赖于对考古学家们在各个考古遗址的不同层面获得的证据,以及早期历史文献提供的统治者的统治年限等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数据的分析。两河流域考古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点,即有大量的文献材料得以保存,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辑于公元前21世纪前期的苏美尔王表记录了最早的国王们的统治顺序和年代。但将其作为历史文献对待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最早的国王们的统治时期异乎寻常的长,有些国王考古证据丰富,完整,但在王表中却无一字记载。同时,一些王表中记载的国王,在考古遗址中的证据完备,并且发现有文献留存。这就有助于早王朝时期绝对年代的确定。

放射性同位素定年在历史时期年代学的确定中用处不大。由于其测定的特性, ^{14}C 测定的年代不足以确定一些细致年代。但是,从马瑞、尼普尔和阿布-萨拉比获得的 ^{14}C 样品对于早王朝年代的确定较之其他方式仍然是有益的。

公元前2000—1000年前期的定年困难重重,但后期的定年,由于和埃及的年代学定年吻合,绝对年代的确定几成定论。确定绝对年代的要点在于确定这样一些点可以把此前、此后的事件联系起来。这样的时间的确定大多依赖于对天文现象的记录文献。对巴比伦的年代学定年,史家们倚重金星运动的文献记录,这就是著名的“金星泥板文书”,是古巴比伦王朝后期的一个国王阿米噪杜喀时期的文献。但是,这些文献提供的并不是确定的年代,而是一些可能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这些特殊的天文现象都有可能发生。这种不连续性造成的后果是,根据这些年代数据,汉穆拉比王继承巴比伦王位的年代在公元前1900—1704年,差距近200年,包括三种确定的年代值:即年代学上限、中限、下限。汉穆拉比即位年代的中限在公元前1792年,巴比伦灭亡在公元前1595年。这个年代值一直为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史学家接受,但近些年来,考古学提供的证据显示,这个年代似乎应向下限靠近。

亚述王表和巴比伦王表也为古巴比伦王朝绝对年代的确定提供了依据。但是由于这些王表的编撰时间要晚于它们记录的那个时期,因此它们的准确性值得考虑。

不幸的是,考古学的证据极其零散,有明确地层的考古遗址也很少。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城市是巴比伦城,而巴比伦城的遗址在这个时期的地层是在水下,无法挖掘。目前,考古学家们试图从周边地区的遗址,如叙利亚的阿卡那(Tell Atchana)中得到证据。阿卡那的年代学定年毫无疑问是确定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年代学定年是和爱琴海地区以及埃及的定年相连的,但是在古巴比伦时期,爱琴海地区和埃及的定年同样是未解的难题。

目前,加瑟(H. Gasche)和阿姆斯特朗(J. Armstrong)正在通过分析考古遗址,主要是尼普尔和戴尔丘(Tell De-der)中发现的陶器来确定公元前2000—1000年的年代学定年。巴比伦尼亚在这段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地层混乱、不连续,因此,研究部分地依赖于埃兰人在苏撒的遗址提供的巴比伦尼亚断层区的证据。陶器的证据表明,在200年内,即公元前1595—1400年之间,陶器的器形保持不变。同样的结论可以从同时期圆筒形印章的演变中

得出。这一段陶器和印章的特点保持不变时期之后，是“正常”的发展的时期。同样的情形在历史时期的考古记录中是极不正常的，它也许会将年代定年体系引入歧途。根据这一分析，学者们认为年代学中限定年太早了。比这个中限稍晚的年代学体系将可符合考古学提供的证据。阿姆斯特朗等的研究成果尚未发表，仍在研究之中。

1987年，哥德堡（Gothenburg）大学举办了绝对年代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此研讨会论文及讨论内容已经结集出版，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藏有此书部分复印件）。研讨会持续两天，与会学者包括对各种方法及各个地区（两河流域、埃及、安那托利亚和爱琴海地区）年代学进行研究的学者。研讨会的主题是年代学的上限、中限、下限定年。会议结束时，学者们就哪一种定年更为合理的讨论未达成一致的意見，但是不再有学者支持中限定年，而下限定年则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另外，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多数的公元前2000年代早期的放射性同位素值是不能依赖的，因为样品的收集技术和实验室技术仍不过关。

两河流域和整个近东地区确定的绝对年代学定年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诸如天文现象的观测记录、历史文献如王表的解释、确定调和 ^{14}C 数据以及遗存物的地层顺序等的综合应用得以确定。希望这些方法能给目前中国所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刘健 译）